

第一章

作為干涉主義的帝國與帝國主義 ——一個觀念史

從蒙特祖瑪的大廳，到的黎波里的海岸；我為我的國家而戰，……首先是為了權利和榮譽……我們是美國海軍陸戰隊。……我們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氣候下戰鬥……

——美國海軍陸戰隊隊歌

……無需區分法西斯帝國主義與民主帝國主義。對那些在非洲的非洲人而言，這種區分毫無意義。

——C. L. R. James¹

我們在生物學上尋出來許多證據，自蟲、鳥、牲畜乃至人類，都是依互助而進化的，不是依戰爭而進化的。由此可以看出人類的進化，是由個人主義向協合與平等的方面走的一個長路程。……依人類最高的努力，從物心兩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類，必能創造出來一個互助生存的世界。

——李大釗²

現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沿着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的精巧斷裂展開。在空間維度上，「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假設暗示了過去在西方資本主義帝國全球擴張進程中形成的對世界陸地、天空、海洋的空間分割已經結束。在

時間維度上，對現代與中世紀、古典時期的清晰分割在認識論上掩蓋了今天西方普遍主義概念與中世紀基督教神學及其政治的緊密聯繫。中世紀基督教天主教會所構想的人間的普世帝國，其道德基礎來源於堅信基督教上帝創造了「秩序」，並給出了「天上之國」這一理想社會樣本。而隨着天主教會人間統一權威的分裂，那種基督教神學對人世間的道德與認識論權威也隨之煙消雲散。這個歷程被稱為「世俗化」。

長時段、廣域的歷史分析，能夠幫助國際關係分析跳出這種斷裂產生的認識論局限。我們很容易便能發現這兩種假設、特別是圍繞着時間維度對「世俗化」、「現代化」問題的假定，實際上並沒有其宣稱的普遍性。天主教會的「普世」權威，僅僅延伸到了歐洲及其歐洲的全球殖民地。而隨着天主教會權力逐漸退場，其他教會之外的共同體開始迫切希望尋找到天主教道德權威的替代物，以期擺脫天主教會掌握的意識形態霸權，建立各自謀求權力的合法性基礎。換句話說，這場「本質主義革命」並未在認識論上反對由天主教神學家們近千年來通過對希臘古典哲學的重述、篩選發展出的一元論的基督教神學宇宙觀，諸如霍布斯、笛卡爾、洛克、培根等早期現代思想家們的理論嘗試，目的是摧毀天主教會——這一政治性的機構——在解釋真理來源上的壟斷權威。在這個思想歷程中，對「自然法」、「個人」以及「理性」概念的系統性塑造，實際上都圍繞着中世紀基督教神學的一元論認識論框架展開。¹而現代西方國際關係對「自由」、「法律」、「人權」、「公正」等普遍性概念的認識，以及諸如「委任制」、「保護的責任」等制度性安排，無一例外都能從中世紀天主教神學建立普世帝國的理想中找到對應物。²這種一元論的基督教神學相信，在神創造「秩序」之前，一切都是混亂與黑暗的。

1 C. L. R. James, *A History of Pan-African Revolt* (Oakland, CA: PM Press, 2012), p.111.

2 李大釗：《階級競爭與互助》，載於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註《李大釗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54頁。

1 關於這個問題的思想史討論，參見：Michael Allen Gillespie, *The Theological Origins of Modern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pp.19-43。

2 William Bain, *Political Theology of International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然而，在亞洲、非洲的文明發展進程中，一方面，並不存在由天主教會帶來的一元論認識論威權；另一方面，特別是在中國，並不存在一個類似於天主教會那樣，既有意識形態權威，又實質性掌握大片土地，並在羅馬帝國衰亡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持續作為一種強大影響力的權力，與各個地方王權分庭抗禮。因此，相應地，那個標誌了西方現代開端的「世俗化」進程，便很難在中國找到相應的現象。但是，如果我們跳出西方學術話語中設置的本質主義框架，將歐洲的「世俗化」進程，還原為其本來面目，即歐洲小規模共同體對天主教普世帝國的文化霸權與政治干涉的反抗，那麼「現代」便可以被視為一種在反抗干涉主義霸權的進程中，主體性自覺的誕生進程。在這個視角下，中國，乃至整個亞非拉世界對干涉主義帝國霸權的反抗，以及隨後對自我主體性的塑造，便也可以被視為現代的開端。在這個意義上，真正多樣性的現代，便開始於對一元論霸權的反抗之中。

作為政治現實的帝國

干涉主義是帝國霸權與理想的武器，但它可以有許多名字。

在倫敦國會大街的南北兩端，分別立着兩尊紀念碑。一尊是北端特拉法加廣場上的納爾遜紀念柱。頂端是 1805 年死於特拉法加海戰的英國海軍上將霍雷蕭·納爾遜（Vice Admiral Horatio Nelson, 1st Viscount Nelson, 1758—1805）的軍裝立像。在紀念碑基座南面的浮雕下方，刻着納爾遜在特拉法加戰役中，通過其旗艦勝利號戰艦（HMS Victory）發出的旗語——「英格蘭期盼每個男人都恪盡其責」。¹ 納爾遜雕像面對着國會大街，順着大街一

路朝南，就到了國會廣場中心的小花園。花園的東北角是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立像。

從納爾遜紀念柱步行到丘吉爾雕像大約 10 分鐘。在短短不到一公里的國會大街上，豎立着 4 尊紀念碑，每一座都代表着從反法戰爭以來，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一個半世紀中，那些塑造了帝國命運的重要戰爭。在這中間，第二代劍橋公爵喬治王子（Prince George, Duke of Cambridge, 1819—1904）於 1862 年成為英國陸軍元帥兼陸軍總司令。1854 年 2 月，他作為英陸軍第一師的指揮官，參加了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 1853—1856）。在他擔任陸軍總司令期間，英國開始在非洲與亞洲不斷征戰。在見證了英國於 1902 年第二次布爾戰爭的慘勝之後不久，他便撒手人寰了。

在喬治王子雕像之後不遠處，就在皇家騎兵衛隊總部附近，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西線遠征軍指揮官道格拉斯·黑格伯爵（Field Marshal Douglas Haig, 1st Earl Haig, 1861—1928）的雕像。再向前走，便是兩座紀念碑。前一座紀念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為戰爭做出貢獻的婦女。之後一座，則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建造的「空塚」（The Cenotaph）。「空塚」最初是一座用木頭與石膏板搭成的臨時性結構。在 1919 年 7 月 19 日的休戰儀式上，「空塚」是整場儀式的視覺中心，用來紀念在一戰中犧牲的士兵。¹ 這座倉促建成的紀念碑立刻就成為了人們注意力的焦點。² 天之後，英國媒體便刊文，希望能夠永久留下「空塚」紀念碑。³ 最終，在 1919 年 7 月 30 日的內閣會議上，英國政府決定，在原址上重建「空塚」為永久紀念碑。⁴

1 關於 1919 年勝利日慶典的籌劃，以及決定建設「空塚」紀念碑的歷史，參見：Eric Homberger, “The Story of the Cenotaph,”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2 November 1976): pp.1429-1430。

2 Allan Greenberg, “Lutyens’s Cenotaph,”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48, no. 1 (1989): pp.5-23.

3 *The Times*, 21 July 1919: p.15.

4 *The Times*, 31 July 1919: p.12.

1 這句話原文是 “England Expects Every Man to Do His Duty”。這個著名信號後來也被 19 世紀其他新興帝國國家的海軍競相效仿。例如，在對馬海峽戰役時，日本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就曾對艦隊發出了類似旗語。

1920 年 11 月 11 日，重建後的紀念碑於停戰周年紀念日上再次揭幕。自建成後，這裏便一直是一年一度的國殤紀念日（Remembrance Day）舉辦地。來自英國與英聯邦的各個武裝部隊、退伍老兵都會身着他們的戎裝禮服，沿着國會大街一路遊行。國殤日的高潮是充滿國教色彩的獻祭儀式。在紀念日當天上午，隨着大本鐘敲響 11 點的鐘聲之後，全國開始默哀 2 分鐘。在此之後，君主及高級皇室成員會依次向「空塚」獻上用虞美人紮成的花圈。隨後是政府首相、反對黨領袖、下議院議長、上議院議長、外相、各個英聯邦高級專員、在世的歷任首相、海陸空三軍代表、以及商船漁船船隊和平民緊急服務隊代表。21 世紀以來，一些原屬於英帝國、英聯邦的國家大使也加入到了敬獻花圈的隊伍。

在這個秩序結構中，聖公會所代表的超越性（transcendancy），君主與皇室代表的道德性力量（morality），首相、反對黨、上下議院議長們代表的政治烏托邦理想（utopia），以及嚴格依照等級次序排列的政府／帝國職能部門所代表的制度性權力（institutional power），均被包裹在一個由全民參與的軍事性典禮之中。在這個國家儀式中，民眾作為被組織者而在場。作為「真實的、有機的生命」，他們被從家庭、鄉村這樣的自然「共同體」（Gemeinschaft）中抽離出來，加入到一個由「帝國」理念與制度驅動的「社會」（Gesellschaft）之中。¹並且，在這種由犧牲構成的共同經驗中，帝國試圖通過祭奠「光榮的死者」（The Glorious Dead），將戰爭轉化為一個被稱為「帝國」的共同體的記憶，並將一個個具體的個體，轉化為帝國「共同體」

讚頌的「無名勇士」（The Unknown Warrior）。¹為了「上帝、國王與神聖的正義使命獻身」是他們成為帝國共同體記憶的唯一原因。

今天，很難有像國殤紀念日那樣，會將一個龐大的、等級森嚴的帝國遺產，包裝在一個現代國家的政治外殼之下。無論是儀式開始前的軍事遊行，還是敬獻花圈的程序，無一不在強化着帝國在管理龐大空間過程中，構建出的意識形態與制度秩序。儀式中的 2 分鐘默哀來自於布爾戰爭時期的一種南非習俗。²建造「空塚」紀念碑的想法，一方面是要與法國的勝利慶

1 「光榮的死者」是雕刻在無名之塚紀念碑上的銘文。「無名勇士」則是在無名之塚不遠處威斯敏斯特教堂內的一塊墓碑，用來紀念在一次世界大戰中犧牲的英國士兵。碑上的銘文寫到：

「……用以紀念那
成千上萬
在大戰中獻出生命的人，
他們為上帝；
為國王與國家；
為家鄉與帝國內所愛之人；
為了神聖的正義使命；
為了世界的自由而獻身。
他們與國王們同葬
因為他們為上帝
為這受神庇佑的地上之國
行了至善之事」（作者自譯）
(Thus are commemorated the many
Multitudes who during the Great
War of 1914–1918 gave the most that
Man can give life itself
For God
For King and country
For loved ones home and empire
For the sacred cause of justice and
The freedom of the world
They buried him among the kings because he
Had done good toward God and toward
His house)

2 Sir Percy Fitzpatrick, memorandum submitted to Lord Milner for the attention of the War Cabinet; PRO CAB 24/CP45 (4 Nov. 1919).

1 這裏對「共同體」和「社會」的界定，參見費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張巍卓譯，商務印書館，2022，第 68-71 頁。

典相媲美；¹ 另一方面，也希望呼應希臘古典傳統，建立一個「能夠代表帝國所有公民的帝國之塚」。² 同時，空塚紀念碑也被設立在英國各個城市、鄉村，以及加拿大、新西蘭、百慕大、中國香港等受到英帝國殖民統治的地區。在中國香港，這座空塚紀念碑還正式被叫作「和平紀念碑」。相比空塚紀念碑，國殤紀念日的影響更為廣泛。除了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前定居殖民地（settler colony）國家之外，在印度、肯尼亞、南非，以及加勒比各國等都複製了這一帝國的儀式。在作為政治單位的帝國早已消失的今天，「紀念帝國與英聯邦軍隊貢獻」的國殤紀念日仍舊作為重要載體，在英國的政治中扮演著承接帝國全球秩序遺產、構建「英聯邦」共同體認同的作用。³

如果說國殤紀念日中傳遞的帝國遺產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懷舊，那麼在空塚紀念碑對面的外交、英聯邦與發展部（Foreign, Commonwealth & Development Office）總部大樓，則不斷在提醒人們，這種帝國遺產即便在今天，仍在不斷影響著世界秩序的構造。這座巨大的意大利式建築羣於1861年由當時的首相巴麥尊子爵（Lord Palmerston）授意開始建造。仔細看它外立面上的浮雕，我們還會發現，在上面天使拱衛的女神中，有的象徵著歐、亞、非、美各洲，有的象徵著貿易、生產、科學、藝術、法律等普遍事業。她們從著裝到身姿上，幾乎都無一例外地顯出白種人的特點。她們的地域或是行業特性，則僅僅通過各自手中持有的器物，或是身後環繞

的自然作物標識出來。

這座龐大的外交、英聯邦與發展部大樓最初由外交部（the Foreign Office）、印度部（the Indian Office）、殖民部（the Colonial Office），以及內政部（the Home Office）四個職能密切相關的政府部門使用。1968年機構改革之後，外交部與諸如自治領部（the Dominion Office）、英屬緬甸部（the Burma Office）、印度部、英聯邦關係部（Commonwealth Relation Office）等其他一些與英帝國形式多樣的殖民管理模式相關的行政部門合併，建立了外交與英聯邦部（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¹2020年之後，又與國際發展局（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合併，組成了如今的外交、英聯邦與發展部。

倘若我們僅僅將帝國視為一種已經在人類政治演進過程中消失的政體，那麼便很難理解國殤紀念日時在世界不同地方如複製一般出現的場景，更難想像帝國又如何同發展、貿易、自治、聯邦聯繫在一起。的確，在今天聯合國193個成員國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名稱中有「帝國」的字樣。但是，如果我們仔細一些，便會發現，作為政體的帝國仍舊在今天的世界中留有痕跡。例如，我們會看到諸如澳大利亞聯邦（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巴哈馬聯邦（Commonwealth of the Bahamas）、多米尼加聯邦（Commonwealth of Dominica）、加拿大自治領（Dominion of Canada）等國家名稱。它們都在提醒著我們，曾經的英帝國其實並未真正離我們遠去。而諸如法屬波利尼西亞（Polynésie Française），美屬薩摩亞（American Samoa）等名字，則在鮮明地告訴我們，殖民佔領並未隨著20世紀去殖民獨立運動而徹底消失。

1 Lionel Earle to Earl of Derby, 13 May 1919, and Earl of Derby to Lionel Earle, 17 May 1919, PRO Work 21/74.

2 文字出自時任掌璽大臣（Lord Keeper of the Privy Seal）博納·勞（Bonar Law）發表於《帕爾默爾報》（*The Pall Mall Gazette*）上的一封題為《大戰中的同志》（Comrades of the Great War）的公開信。勞在1922年末曾短暫出任保守黨黨魁，並擔任首相。轉引自：S. Brisley, *The Cenotaph Project* (Derry: Orchard Gallery, 1991), unpaginated。

3 HL Deb 4 June 2018, vol 791, col 1204. URL: <https://hansard.parliament.uk/lords/2018-06-04/debates/EA57B6BE-CEA6-4A13-9F3F-99B3DB24D332/FirstWorldWarEmpireAndCommonwealthTroops>, 最後訪問時間：2024年1月31日。

1 關於英國外交部的歷史及其演變，以及對於英國外交部的研究綜述，參見：Gaynor Johnson, ed., *The Foreign Office and British Diplom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05)。

同樣，帝國還以一種隱祕的形式，繼續在今天世界的政治、經濟與文化領域中產生着整體影響。從 19 世紀以來，對全球秩序的討論都圍繞着帝國展開。他們以西方歷史經驗為中心，通過對全球歷史或政治的普遍化敘述形成體系。這個過程以英國全球帝國的形成為依託，表現為一種英國式帝國論、文明論、世界觀的全球散播與變形。這一文化的霸權對當下世界影響至深。在今天「英美特殊關係」、「五眼聯盟」的背後，我們不難看到 20 世紀初「盎格魯世界」(Anglosphere)、「盎格魯—美利堅主義」(Anglo-Americanism)、「白人的國家」的深刻影響。¹ 在「自由國際秩序」的表述背後，則潛藏着「自由帝國主義」(liberal imperialism) 的影子。² 在國際政治領域，我們曾經經常聽到關於「失敗國家」(failed states) 以及這些國家為什麼「失敗」的討論。這些國家絕大多數都是那些 20 世紀中葉，在亞非拉民族獨立浪潮中獲得政治獨立的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國家失敗的理由，則多被認為是內生性、制度性的。³ 同樣，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強調西方工業化發達國家需要為不發達國家提供「外力」，帶領廣大的經濟落後國家實現工業

化和現代化，推動其發展的認識，則更是影響深遠。¹

英國「外交」部門的機構變化，直接反映了綿延了整個 20 世紀的世界性大變局。在這場巨變中，爭奪全球霸權的活動從歐洲擴展到了全球。在傳統西方中心的國際關係史敘事中，這個進程體現為從維也納會議 (1815)，到巴黎和會 (1919)，再到雅爾塔會議 (1945) 的迭代。這三場和會分別對應了以歐洲為主戰場的拿破崙戰爭，調動了歐洲國家所有海外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且擴展到了亞非大陸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最終將四大洲 (亞、非、歐、美) 以及兩大洋 (太平洋、大西洋) 都捲入戰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這種敘事的基礎圍繞着「權力均勢」(balance of power) 展開。實際上，對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而言，「權力均勢」幾乎像是一個元理論。同國際間「無政府狀態」的假定一起，共同塑造了整個西方國際關係的理論大廈。

-
- 1 關於盎格魯世界觀念對今天五眼聯盟以及西方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觀念的影響，參見：Srdjan Vucetic, *The Anglosphere, A Genealogy of a Racialized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2 Duncan Bell, *Reordering the World: Essays on Liberalism and Empire* (New Have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Onur Ulas Ince, *Colonial Capitalism and the Dilemmas of 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3 這類制度主義的研究不勝枚舉，例如：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Currency, 2012)。

-
- 1 陳其人：《殖民地的經濟分析史和當代殖民主義》，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4。在陳其人的梳理中，他對諸如第二國際歐洲社會民主黨人、二戰之後西方左翼知識分子，以及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殖民地發展理論提出了極具價值的洞見。他提出，這些理論均未從被殖民地地區的角度出發，忽略了殖民本身對殖民地不發達狀態的直接影響，也忽略了殖民與半殖民地國家與人民自主謀求擺脫不發達狀態的政治實踐。另外，他還分析了一條從費邊主義到羅斯托 (W. W. Rostow) 的「壟斷資產階級的非殖民地化理論」線索。並認識到，在維護宗主國利益方面，羅斯托所代表的現代化理論同殖民主義的發展觀並沒有本質區別。更有意思的是陳其人對西方左翼發展觀的洞見，他敏銳地注意到了諸如翁貝托·梅洛蒂 (Umberto Melotti)、馬爾科姆·考德威爾 (Malcolm Caldwell) 與肯尼斯·塔巴克 (Kenneth J. Tarbuck) 等戰後西方左翼對「亞細亞生產方式」這個範疇的討論，實際上將不發達問題重新歸咎為這些「不發達」地區的內生性問題。在這點上，西方左翼表現出了與西方「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樣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這個基於思想史梳理提出的批判，對今天從長時段、整體性視角思考帝國問題極有幫助。

作為「美好共同體」的帝國

那種國際間黑暗森林式的無政府狀態想像，對應了基督教神學中一元論創世神話，為構建「自由利維坦」與「世界帝國」提供了合法性。終結那種無序的、黑暗的恐怖狀態的唯一可能，就是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一個帝國式的威權秩序。創世，便意味着上帝創立的「神之國」的開始。而世界帝國的形成，則毫無疑問，是要在人間實現神之國的理想。在此基礎上，幾乎所有的帝國都將自己視為向善且永恆的普遍秩序。帝國的自我敘述幾乎都建立在道德、正義、發展、和平等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概念上。但是，當今天的我們倒敘地去審視帝國時，卻很容易忽略這個事實。帝國的衰落因此也被習慣性地從一種決定論的視角出發，視為經濟實力與軍事能力競爭失敗的結果。¹而制度或是文化，則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被視為決定這種經濟、軍事實力強弱的本質因素。實際上，自 20 世紀中葉以來，以美國理論家為主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們，更樂意用「大國」（great powers）這一概念來指代諸如英、法、西班牙等近代早期資本主義全球擴張進程中形成的帝國。並以西方「大國」的近代歷史變遷為基礎，構建了一套充滿美好色彩的現代化論述。例如，在 20 世紀中葉出現的以社會學為學科背景的經典現代化理論思想家們，將他們對世界秩序的構想聚焦於工業化、城市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過程。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從系統理論與結構功能主義出發的現代化認識強調，現代化就是一個複雜系統的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方面相互作用下，推動社會向更高級狀態、更具差異化發展的複雜過程。²羅斯托（Walt Rostow）則提出了「經濟增長階段」理論，以美西方的現代化經驗為基礎，用一種目的論的線性史觀，將現代化過程分為從「傳統社會」、「起飛準備階段」、「起飛階段」、「邁向成熟階段」，再

到「高度大眾消費時代」五個階段。¹此外，這個脈絡裏還包括諸如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對現代化教育、城市化、收入水平提高等因素促進民主制度建立的研究。²以及摩爾（Wilbert E. Moore）對文化因素，特別是價值觀和信仰的變化在現代化過程中所起作用的討論。³

有趣的是，諸如「發展」、「制度」、「教化」、「自由」、「和平」等一系列佔據這類現代化理論核心位置的道德許諾，都能在那個被遺忘的殖民擴張帝國時代的秩序敘述中找到對應物。通過「勞動」對美洲土地的「發展」（improvement）以增加其「價值」，是洛克（John Locke）為英格蘭殖民美洲給出的理由。⁴而「制度」與「自由」則是希里在論證英格蘭何以能夠擴張全球時給出的基本答案。⁵而 20 世紀初劍橋牛津的帝國史學者們，則對通過「教育」整合殖民地精英，促進殖民地向文明化的轉變寄予了厚望。

當我們在一個帝國理由的框架內，將這些充滿理想主義意味、思辨縝密的論述，與 20 世紀中葉美國理論家們對「現代化」問題的思考連起來讀時，便更能理解從長時段視角出發討論帝國問題，對今天構想世界秩序，思考知識自主性問題的重要意義。這一思考，能幫助我們發現知識體系中潛在的真正具有西方中心主義色彩的內容，並進一步追問，在追求自由、公正、和平、發展這些人類普遍目標時，從我們的經驗與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理論抽象，究竟與那些西方中心主義認識論構想的世界秩序有什麼本質區別？

-
- 1 Walt Whitman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3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2 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1960).
 - 3 Wilbert E. Moore, *Social Change*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64).
 - 4 John Lock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and 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first published 1689/169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23.
 - 5 J. R. 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Two Courses of Lecture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14).

1 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蔣葆英等譯，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

2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Cambridge: Free Press, 1951).

回答這個問題的基本前提之一，是需要將一切對普遍秩序的構想還原成為對現實世界的回應。不難發現，羅馬帝國的擴張與衰亡是構成歐洲這片地理空間上共同體間關係的基本歷史前提。截止到公元 395 年羅馬正式分裂為東西兩個帝國之時，兩個政治共同體整合的地理空間大約有 4 百萬平方公里。¹ 在此之後，歐洲這片地理空間上大大小小的政治共同體便在謀求重新整合更大的空間，建立更大的共同體，與謀求保持小共同體獨立性的競爭關係中不斷消長、變遷。在這種條件下，持續的戰爭狀態成了歐洲面臨的常態。

我們不妨用邁克爾·曼所描述的「多重交疊和交錯的社會空間的權力網絡」來理解這個歐洲共同體間的複雜關係。² 在邁克爾·曼以權力為核心的分析中，他將權力分為權威性（authoritative）與彌散性（diffused）兩種類型，前者存在明確的中心。它表現為以集團或制度的「意志力」為主體，對空間與人口的組織、指揮與調動能力。而後者，則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礎上，表現為人們對某種意見的認可或服從。而依照權力能觸及的地區、人口規模的大小，以及權力對社會不同個體要求義務的多少程度，他又區分出了廣泛性（extensive）與深入性（intensive）兩種權力表現形式。³ 共同體擴張與穩定性的問題，同時也被轉化為統治集團整合不同社會網絡能力的問題。然而，這種極具結構美感的框架假定了權力一元性的來源。在此基礎上，權力本質上被還原為統治與被統治、控制與臣服、干涉與躲避的關係。這種結構的問題在於，他並未能夠很好地解釋權力來源的「第一推動」問題。事實上，對來源問題的本質主義解釋，是所有一元認識論的邏輯起點。但

是，這種認識論並不能很好地解釋這種控制與臣服的結構本身如何形成的問題。這樣，共同體衰落便被一般性地視為一種不同共同體競爭導致的權力轉移的結果。在國際關係領域，這種結構性的權力轉移與競爭，被廣泛地用作理解國際間秩序的公理性原則。

然而，如果我們嘗試跳出這種一元論哲學，便可以追問那種對「無序」的恐怖想像，究竟多大程度上是普遍的。實際上，如果我們從辯證哲學的角度出發，將秩序視為人與人、共同體與共同體自然互動的天然結果，將這個過程中自然產生的合作與衝突視為不同自然與社會語境下的自主反應，那麼便能給出一個截然不同的秩序想像。從互動關係角度出發，我們可以將人與人之間的廣泛聯繫視為社會關係的基本構成單位，將權力視為這種互動聯繫的必然結果。同時，任何一種形式與規模的共同體，其形成的基本目的可以被理解為最大可能地謀求幸福。而隨着不同共同體的擴大、疊加與互動，反應出來的權力關係與結構也必然愈發地複雜。某個共同體謀求的幸福，可能會以另一個共同體遭遇不幸為代價。在這種情況下，「公益」（common good）的實現則成為考驗不同共同體整合多種複雜權力關係能力的重要準則。能否實現更大共同體內的公益，則成為決定共同體規模及其穩定性的重要因素。在這種辯證關係下，各種權力關係的雙方，實際上都參與到這種共同體關係的塑造中。當然，在任意一種確定的權力關係中，權力雙方必定會佔據一個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位置。但是，我們仍然能夠通過辯證法的方式，來理解這種具體權力結構中的主從、強弱、大小的關係。具體地來說，權力出現及其網絡化、複雜化的前提，是人們建立一個更大、更富足、更穩定共同體的意願，與維持這種共同體穩定性的物質局限之間的辯證關係。

人們社會關係的展開既具有時間性，也具有空間性。個體的人，必須在某種特定空間中才能與他人發生有意義的聯繫。這種聯繫本質上就是信息以不同形式的傳遞。這種複雜的信息傳遞，則為共同體賦予了一個時間維度。同時，共同體所依賴的空間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無形的——

1 Rein Taagepera, "Size and Duration of Empires: Growth-Decline Curves, 600 B.C. to 600 A.D.," *Social Science History* 3, no. 3/4 (1979): pp.115-138.

2 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第 1 卷，劉北成、李少軍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 年，第 1-3 頁。

3 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第 1 卷，劉北成、李少軍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 年，第 10-11 頁。

我們可以稱之為想像的，但毫無疑問，這些空間都來源於某種物質性的基礎。例如，家庭、部落關係誕生的前提，是兩個以上的人在一塊共同土地上的居住。宗教意識形態的聯繫基於某種形式的對共同信仰的知曉。道路、交通工具、乃至今天高速信息網絡的建設，本質上僅僅是壓縮了信息從一個物理空間傳遞到另一個物理空間的時間，共同體建構所需要的時間與空間維度，至少迄今為止，並未隨着人類歷史的發展而有任何本質上的變化。

共同體建構的時間屬性，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共同體在空間上能夠延伸的最遠距離，以及能夠容納的最大人口。這個時間屬性同樣可以被理解為物質性的信息傳遞的效率。從軍隊的調動、到貨物與貨幣的交換、再到人口的遷徙、甚至是信仰與認同的建構，均能被還原為時間性的問題。同時，共同體間權力「深入性」的問題，也對共同體穩定有着極為重要的影響。這種深入性並非一般意義上權力沿着一個固定的制度結構，自上而下地滲透，而需要被理解為權力關係中，主從、大小、強弱位置轉化的可能性與流暢程度，以及不同權力網絡之間重疊的密度。羅馬帝國衰亡之後，遍佈歐洲的「權力網絡」也可以被視為依照不同原則連接起來的大小不一的共同體。它們或者圍繞宗教意識形態、或者依賴王權或更小的土地貴族，不斷嘗試整合不同更小規模的共同體及其資源，以求按照各自的理想，建設「美好共同體」(communitas perfecta)。對現代國際關係而言，民族國家的界限成了標識共同體之間差異的最基本單位。但是，從歷史與廣域的角度來看，這僅僅是劃定共同體邊界的一種特定方式。¹帝國，毫無疑問也是這種建設更大共同體途徑的一種。並且，歷史性地來看，國家這類治權的邊界既不是固定不變的，也不能完全阻攔其他共同體之間在不同維度、層級

上的廣泛聯繫。大到貿易關係、宗教認同，小到歐洲皇室間的血親聯繫、個體的跨國旅行，這些不同規模、不同層級的共同體關聯超出了民族國家領土規定的空間範圍，但又對各自聯繫的國家產生了或大、或小的政治影響。這種影響，反過來也具有塑造共同體權力變化的可能性。

相比國際關係所依賴的諸多本質主義概念來說，共同體能夠幫助我們在一個更加動態、辯證的關係下，理解秩序的形成與演變，以及不同羣體之間交往、交流、融合、衝突所蘊含的歷史哲學意義。一個美好共同體必然是在廣大的空間與人羣中，在和平與穩定的環境下，公益的持久實現。而這種共同體的塑造，必須建立在對不同規模、不同維度共同體的整合基礎上。這種整合需要滿足權力「深入性」的條件。這也需要每一個構成共同體的個體能夠在共同體生活中被賦能。這種人人成聖、人人平等、人人富足的理想是「美好共同體」最理想的狀態。而既然建設「美好共同體」可以被視為人們形成權力關係的根本目的，那麼任何一種共同體的解體，則可以被認為是它背離這一保證的政治結果。與之相對，共同體內制度的構建、共同體的社會變革、甚至共同體的延伸，都可以被視為不同主體嘗試通往這一「美好共同體」進行的主動探索。在這個過程中，或者可能構成更大、更深厚、更穩定的共同體；也可能出現不同共同體的崩潰、解體與消失。在這個視角下，國家不再單純是一種霍布斯式的壟斷暴力的機器，而是在謀求「美好共同體」的進程中，一種龐大的複雜制度安排。與其將之視為「必要的惡」，我們不妨將之視為受限制的善。它在謀求美好共同體的進程中形成。其善意，受制於它期望在什麼物質基礎上，為哪一個共同體，通過怎樣的途徑，實現何種規模的公益。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能將國家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而非僅僅是戰爭調動的能力，作為一種框架，來理解國家行為以及不同共同體興衰的原因。公益的邊緣，決定了共同體的規模與穩定程度。從這個角度出發，歐洲的世界帝國塑造及其衰落，便有了能與非西方世界進行比較的意義。一個以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為手段的帝國秩序，其善意是有限的，因為它在其所整合的空間中，僅僅在有限的共

1 在這裏，我贊同愛德華·基恩從共同體角度對現代國際關係學科局限性進行的批判。參見，愛德華·基恩：《國際政治思想史導論》，陳玉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第12頁。

同體中實現了某種程度的公益。而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共同體，則終會對這種有限的公益提出挑戰。帝國的衰落，是其對美好共同體承諾背叛的最終結果。

帝國概念的歐洲起源與散播

歐洲人對「帝國」(imperium)的認識與對羅馬的歷史記憶緊密相關。「Imperium」本意是羅馬執政官對其公民行使的權力。這種治權相對穩定且具有明確的層級與制度。這種治權在羅馬不斷擴張的初期，以城牆為界，並不延伸至那些由羅馬居民建立的農業定居點(coloniae)。而隨着佔領的擴大，以及對諸多定居點管理能力的上升，一個更為集中的、普遍的、針對所有佔領地帶的「羅馬治權」(Imperium Romanorum)開始形成。當然，羅馬帝國的擴張並未就此終結。在權力整合相對完善，政治統治相對穩定的地區，一種「本土治權」(imperium domi)得以適用。而在仍舊處於軍事征服狀態下的遙遠邊疆地帶，則實行的是一種由軍事領袖掌握的、軍事威權式的無限權力(imperium militiae)。羅馬的分裂，終結的是羅馬治權的穩定，但並未終結歐洲對「帝國」作為穩定治權秩序的認同與想像。在英國，早期的盎格魯—撒克遜國王便開始醉心於在他們控制的土地上，複製羅馬建成一個「盎格魯治權」(Imperium Anglorum)。首任英格蘭國王埃塞爾斯坦(Æthelstan, 924—940)便會用「皇帝」(imperator)這個極具羅馬意味的頭銜來稱呼自己。¹

儘可能控制更大的領土，並在控制區域內建成這種帝國式的穩定治權，始終是歐洲國際競爭的主線。當1451年，熱那亞人克里斯托弗·哥倫

布(Cristoforo Colombo, 1451—1506)剛剛出生時，東羅馬帝國正在面臨來自奧斯曼帝國的巨大挑戰。兩年之後，在經歷了58天的守城戰爭之後，東羅馬帝國艱難維持的領土共同體正式滅亡。這也標誌着歐洲近代早期歷史的開端。在這之後39年，哥倫布終於成功說服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一世資助他探索新航道，以求繞過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對東南亞貿易線的控制。對近代早期的歐洲君主們而言，哥倫布探索的成功，開闢了一種新的財富積累途徑——遠洋貿易。而在此之前，對那些從羅馬帝國疆域中分離出來的歐洲各國領主們而言，土地才是相互爭奪的重點。¹

在歐洲的政治與文化想像中，對於外敵入侵、人口增長、經濟衰退等一系列影響自身「生存空間」的憂慮，對新興力量「崛起」的恐慌始終是關鍵主題。因而，從經濟學和生物學角度出發構建起的命定論思想，也牢固地支撐起帝國主義的軍事擴張與經濟政治霸權思想。這種命定論既促生了確證本階級、本民族霸權地位必然性的各種帝國辯護，促生了阻止本國殖民屬地、甚至形式上獨立的亞非拉海外國家等半殖民地實現工業化的思想；也促生了悲觀的、反自由貿易、主張保護主義的論述。²從歐洲內部各個「領土國家」之間的相互猜忌，到「民族國家」興起之後的敵意，再到對歐洲之外新興美國的懷疑，歐洲中心主義的世界秩序觀本質上是一種建立在恐慌感上的帝國辯護，其所構建的敵人始終在隨着政治現實的需求與經濟格局的動盪而變化。

在這種持續不斷的對抗壓力下，歐洲君主國在16世紀末開啟了他們向更大規模的現代複合制國家的轉變進程。同時，這也往往伴隨着歐洲國家從鬆散的領土國家向民族國家的轉變，以及組建帝國的野心。在這個過程中，領土的私有化是處理不同民族、團體之間矛盾的主要方式。在這種理

1 理查德·克伯納：《歐洲的開拓與殖民》，M. M. 波斯坦編：《劍橋歐洲經濟史》第1卷，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第1-79頁。

2 海因茨·哥爾維策爾：《黃禍論》，商務印書館，1964，第11-13，31-49頁。

1 Armitage,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pp.24-32.

想型的「民族國家」中，領土歸屬於一個具有「共同出身」的共同体。從歐洲的經驗來看，混居被非歷史性地視為一種舊帝國的遺產。而在不同民族混居的情況下，和平解決衝突的唯一方式則需要遵從一個獨立國家的領土邏輯。即只有他們形成「各自獨立的『民族國家』時，衝突才能得到化解，民族羣體之間的平等關係才能得以重建」。可悲的是，這一邏輯也可以順勢推導出種族清洗的解決思路。¹

這種以財產私有權為立國基礎的國家始終處於「危機」之中。通往永久和平、解決領土安全問題的途徑要麼是形成基督教自由國家的聯邦，要麼則是建立一個同質的世界帝國。然而，脫離了統一教權的歐洲大陸君主從來面對的都是有限的、已被佔據的土地。因此，在無休止的戰爭之後，17 世紀歐洲國家嘗試通過合約來劃定歐洲「國際間」的領土所有權、達成「和平」。這在今天的國際關係歷史敘述中，仍被視作現代條約國際體系的起源。這種敘述淡化了歐洲國家競爭的另一個關鍵層面，即歐洲國家向中亞、以及海外「無主之地」的擴張。

早期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海外擴張活動是封建式的。14 世紀黑死病流行造成的人口減少，對靠地租生活的軍事貴族與教會組織造成了嚴重壓力。在尋找新的農業產地與勞動力的訴求下，成規模的奴隸貿易興盛了起來。14 世紀晚期，對農產品、奴隸勞動力、奢侈品和貴金屬的需求使得商業與商人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日漸重要。但由於國王就是最大的商人，因此，在這些舊殖民主義國家中，階級結構並未發生重大轉變。² 然而，這種以貿易為主的擴張形式將私有化的觀念從陸上帶到了海洋。自 16 世紀起，葡萄牙憑藉其在印度洋沿岸的影響力，開始以通行證的形式，向這片海域的

貿易商徵收稅款。這也正式開啟了與「陸上帝國」迥異的「海洋帝國」時代。¹ 這種「海洋帝國」，則意味着對更多維的空間進行分割的開始。

帝國主義觀念的去政治化

對於中國讀者而言，列寧給出的作為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概念最具影響力。然而，在歐洲的語境中，帝國主義（imperialism）概念並不具有這樣的政治批判性，最初它被作為對敵人的抨擊而出現。當「帝國主義」一詞最早於 19 世紀中期出現在英語語彙中時，毫無疑問是一個貶義詞。它僅被用於描述法國「軍事政府」的擴張政策。² 在出現的很長一段時間裏，「帝國主義」都僅僅停留在公共媒體中，被視為波拿巴主義或拿破崙主義的同義詞。³ 而「拿破崙主義」在公共媒體上則意味着「命令與控制整個世界」的恐怖企圖。⁴ 同樣，作為「獨裁者們精神實質」的「帝國主義」，則更是不符合「民主主義者」獨立精神的「專制主義」，是真正愛國、熱愛自由的「憲章主義者」們所必須摒棄的「偽裝的暴君」。⁵

在英帝國史研究內部，最早嘗試為「帝國主義」一詞「脫敏」的學術性論著出版於 1924 年，它是丹麥歷史學家博德森（C. A. Bodelsen）對維多

1 〔日〕羽田正：《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跨國公司如何創造二百年歐亞整體史》，台北：八旗文化，2018，第 62 頁。

2 “Multiple News Items,” *Standard*, 5 March 1833; “Lucien Bonaparte, Prince of Canino,” *Freeman’s Journal*, 8 Aug 1833.

3 例如，1840 年英國一份地方性報紙的「國外情報」（Foreign Intelligence）欄目描述了西班牙巴爾多梅羅·埃斯帕特羅（Baldomero Espartero）的政變。在轉述支持埃斯帕特羅的《首都》（*Capitole*）雜誌觀點時，報紙將這份雜誌評論為「拿破崙主義，帝國主義與軍事獨裁的支持者」。“Foreign Intelligence,” *Westmorland Gazette*, 25 July 1840, 2.

4 “London,” *Morning Post*, 18 Jan. 1828.

5 “Chartist Independence v. Imperialism - No. I,” *Lloyd’s Illustrated Newspaper*, 5 Jan. 1845. 在此之後，至同年 6 月，該報紙又以類似題目連載了數篇討論。

1 〔英〕伊斯特凡·洪特：《貿易的猜忌：歷史視角下的國際競爭與民族國家》，譯林出版社，2016，第 427-434 頁。

2 Eric R.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pp.108-115.

利亞時代中期「帝國主義」觀的研究。該研究是博德森提交給牛津大學的博士論文。其中，博德森將帝國主義視為「英帝國維護與穩固其帝國統一的行動」。¹在這種認識下，學者們一般以古羅馬的政治實踐中出現的「治權」（imperium）這一公法概念為基礎，將「帝國主義」作為帝國對其所轄範圍內領土及人民行使「治權」的系統表現。這種對於「帝國主義」觀念思想史的追溯，有明確的西方中心主義視角。而較早跳出英帝國中心主義，對「帝國主義」概念進行系統闡釋的英文歷史研究著作之一，是威廉·朗格（William L. Langer）對 1890 年至 1902 年間歐洲列強全球競爭的討論。

朗格對帝國主義的論述完成於 1935 年。經他梳理的「帝國主義」，被限定在國家間「實力政治」的範疇，將資本全球流動對國家行為的支配作用排除在考察範疇之外，同時更對資本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作用毫無興趣。他認為，帝國主義是由於「歐洲霸權競爭進入死局」，是越發強大的內部壓力讓歐洲工業強國轉向海外，尋找市場，並相互競爭的結果。作為對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觀的批判回應，朗格通過將帝國主義一般化、制度化的「客觀」方式，為歐洲帝國，及其全球擴張進行了辯護。他在一戰前後歐美學界對諸如亞述、埃及以及希臘、羅馬帝國的研究基礎上，提出「帝國主義與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一樣古老」。因此，將「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結合起來並「加以譴責」，對「重建與理解歷史」毫無裨益。朗格將「帝國主義」一詞的起源追溯至羅馬時期的「皇帝／大將軍」（imperator）概念，其基本特點則全部來自於羅馬帝國的經驗，即「獨裁權力、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以及對地方獨斷專行的管理模式」。²

與先前的英帝國史研究者不同，在朗格筆下，帝國問題不再是一個英

國及其全球擴張的歷史，而帶有了歐洲中心式的「普遍主義」色彩，成為歐洲列強以及日本這一新興帝國在全球範圍內爭霸的現實主義強力政治博弈。在朗格看來，19 世紀末英國的「帝國主義」，即等同於同時期德國的「世界政治」（Weltpolitik）觀。究其本質，是歐洲工業化國家對亞非落後國家的市場通過「和平滲透」形成一定的穩定局勢之後，在 19 世紀末期，隨着德國這一「急進的競爭者」崛起之後，對英國霸權優勢形成挑戰的結果。¹朗格對於「帝國主義」觀念與政策的區分，以及從實力政治角度出發，將帝國主義理解為國際層面上國家之間經濟與軍事「競爭」的看法，影響了之後美國學界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以及 20 世紀末新自由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²不過，對包括朗格在內的美國學者而言，將帝國主義視為霸權競爭僅僅處理了問題的一半。它回答了國家為什麼需要海外擴張的內驅力，而並未給出國家為什麼能夠擴張的道德合法性敘述。後者恰恰對 19 世紀至 20 世紀中期的英國，以及二戰之後迫切希望開啟「美國世紀」的美國而言更為必要。

英語世界對「帝國主義」的去政治化脫敏，其思想論爭的對象是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帝國主義論述。在這其中，隨着蘇聯的誕生，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成了一個西方學者繞不開的政治與思想雙重挑戰。取消列寧的理論原創性，將其視為一種經濟決定論的帝國主義分析方法，切割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必然關係，這是西方學者在理論上採取的基本策略。在這一方向上，學理方面最為成功的是 20 世紀中期，由約翰·賈力格（J. Gallagher）與雷納德·羅賓遜（R. Robinson）提出的「霍布森—列寧論題」（Hobson-Lenin thesis）。

與 19 世紀的自由帝國主義者不同，兩人不得不面對二戰之後殖民地與

1 參見：C. A. Bodelsen, *Studies in Mid-Victorian Imperialism*, 2 ed.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8), p.7。在書中，博德森追溯了從希里開始，到「帝國聯邦聯盟」（The Imperial Federation League）諸人的「經典帝國主義敘述」。

2 William L. Langer,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1902*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6), 67-68.

1 Langer,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1902*, pp. 415-416.

2 這一點在漢斯·摩根索在《國家間政治》一書中對「帝國主義」的論述中體現的非常明顯。對於摩根索的討論，參見：佩里·安德森：《原霸：霸權的演變》，當代世界出版社，2020，第五章。

半殖民地獨立浪潮的現實衝擊，以及列寧等從馬克思主義角度出發對「帝國主義」問題的批判。在他們的名作中，兩人將列寧的帝國主義論視為理論對手。但是，他們卻儘量迴避列寧帝國主義論與其他所有歐洲／西方中心主義帝國主義論述之間的根本差別，嘗試將其視為對約翰·霍布森（John A. Hobson, 1858—1940）帝國主義論的延續，並提出了「霍布森—列寧的帝國主義論」這一說法，誇大兩者之間的相似性。

當然，同先前的帝國主義辯護士不同，兩人的研究承認，在自由貿易的「反帝國主義」敘述的掩蓋下，英國的帝國擴張從未停息。甚至到了19世紀末，當遭遇諸如德國、比利時、法國等其他歐洲新興工業列強國家的挑戰時，英國自由貿易資本主義精英們毫不猶豫地引入了一種「新重商主義」，動用國家的力量，保障英國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的優勢地位，維持以英國為霸權中心的「世界主義」帝國秩序。¹這種用國家力量保障本國資產階級在全球競爭中優勢地位的現象，在19世紀末歐洲列強瓜分非洲的進程中表現的尤為明顯。²但是，賈力格與羅賓遜提出了「自由貿易帝國主義」（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這一觀念，斷開了「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內在聯繫。³在這一觀念下，「擴張」不再是帝國政治的需求，而成為私人貿易與資本追求利潤的必然結果。⁴由私人資本而非國家驅使的帝國擴張，解釋了為什麼19世紀歐洲列強，特別是英帝國的國家機器，在全球各地殖民地與半殖民的權力分配極不平衡的特點。

「自由貿易帝國主義」觀本質上推進了朗格的現實主義帝國觀，將商業霸權擴張與帝國主義的統治割裂開來。不但用競爭解釋了歐洲列強在全球霸權擴張過程中相互之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它也解釋了霸權內部資本

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然而，在這種現實主義的邏輯下，賈力格與羅賓遜還隱藏了一個自由主義的基本道德判斷，即商業擴張必然帶來社會平等與文明進步。而帝國這台政治機器，則既能為商業擴張提供保障，也能從商業擴張中獲取政治優勢。恰是這一點，使得「自由貿易帝國主義」觀成為自由主義帝國觀的精神延續。並且也為帝國主義的全球「干涉」政策，提供了合理性與合法性論述。

為「帝國主義」脫敏的另一個層面，在於儘量斷開帝國擴張與戰爭暴力的聯繫。為此，賈力格和羅賓遜引入了經濟史學家、凱恩斯的好友，查爾斯·萊利·費（Charles Ryle Fay）在《劍橋英帝國史》中提出的範疇——「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¹在賈力格和羅賓遜之前，非正式與正式帝國這組概念，主要指代的是兩種不同的帝國統治形式。後者指通過軍事與政治擴張，正式行使治權的殖民地，前者則是「非政治性」的，由商業擴張而獲取的勢力範圍。而在「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論述中，「政治」與「商業」這兩種影響正式與非正式帝國產生的力量則相互密切關聯。²賈力格和羅賓遜認為，維多利亞時期的「官方意志」（official mind）有意識地通過「自由貿易」而非軍事行動，在全球構造一個「非正式帝國」。³由此，帝國彷彿

1 C. R. Fay, "The Movement Towards Free Trad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ed. J. Holland Rose, A. P. Newton, and E. A. Beni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0), p.399. 在這裏，「非正式帝國」主要被用來解釋英國19世紀上半葉在中國的貿易擴張行動。

2 Gallagher an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p.7.

3 Gallagher an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11. 這一點在帝國史研究內部也引起了許多爭論，例如：同時，「自由貿易帝國主義」觀在美國帝國史研究中也引起了廣泛討論，參見：Wm. Roger Louis, ed., *Imperialism: The Robinson and Gallagher Controversy*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1976). 美國帝國史研究中的威斯康辛學派更用這一概念來解釋美國帝國主義的歷史。參見：Paul Kramer, "Power and Connection: Imperial Histor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6, no. 5 (December 2011): pp.1348-1391; Elizabeth Cobbs Hoffman, *American U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Frank Ninkovich, "Ideology, the Open Door, and Foreign Policy," *Diplomatic History* 6, no. 2 (Spring 1982): pp.185-208; H. W. Brands, *What America Owes the World: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 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6, no. 1 (1953): pp.1-15.

2 Ronald Robinson, John Gallagher, and Alice Denny,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the Climax of Imperialism* (London: Macmillan, 1962), pp.1-6.

3 Gallagher an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pp.1-15.

4 Robinson, Gallagher, and Denny,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the Climax of Imperialism*, p.3.

變成了促進全球貿易聯繫，推動人類進步的仁慈世界君主。

影響英帝國史這一變化的關鍵思想史事件有三個，其一是 1902 年，布爾戰爭後，約翰·霍布森從自由主義左翼脈絡上，將「帝國主義」闡釋為英國資產階級海外擴張，並對此進行批判。另一個則是 1916 年，列寧在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從馬克思主義思想脈絡中，對霍布森帝國主義論的再闡發。而社會主義蘇聯的正式成立，則從現實上使得列寧的帝國主義批判無法被忽視。客觀上，這一國際政治格局的重大變化，也使得霍布森的帝國主義批評完成了對英國帝國史論述的反向輸入。第三，可能也是「自由貿易帝國主義」觀直接的問題意識來源，則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殖民地解放運動。通過討論英國 19 世紀末「有意識地」通過推動自由貿易，建立「非正式帝國」，賈力格與羅賓遜構造了一個帝國主義內部的反帝敘事，並將其作為二戰之後去殖民歷史的前史。¹這是帝國史內部對第三世界去殖民運動歷史主體性的消解，這一工作的起點，開始於將「帝國主義」局限為殖民的領土擴張。

為了消解來自社會主義蘇聯的挑戰，在對「自由貿易帝國主義」進行分析時，賈力格和羅賓遜不得不對「自由貿易」與「壟斷」(monopoly)加以區分。他們認為，19 世紀中後期的英國自由主義政治家們所推動的「不列顛治世」(pax Britannica)，其目的是「解放」(liberation)而非「佔領」(acquisition)，而通往「解放」的手段則是「自由貿易」，而非「壟斷」。²通過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觀念，帝國史研究者們不但在一條希里開創的帝國辯解中，看到了白人殖民地自治運動中表現出的帝國延續性，也在維多利亞時代中晚期英國在非洲、中國新疆地區及中亞等地的擴張行動，以及對

海峽殖民地和中國東部沿海港口的控制中，看到了帝國組織的應變能力。¹

通過賈力格和羅賓遜的工作，帝國史研究得以將視野擴大到拉丁美洲、中東、中亞、中國等「非正式帝國」。當然，也有不少帝國史研究者對「非正式帝國」是否真正存在，或者能對英帝國全球經濟與政治優勢地位有多大影響持懷疑態度。²但這些批評並未挑戰「自由貿易帝國主義」觀的核心自由主義假設，即貿易必然帶來自由。實際上，在 20 世紀末的帝國史研究中，新一代的帝國史學家們更進一步發展了在「自由貿易帝國主義」框架內發展的「非正式帝國」觀念。諸如彼得·凱恩 (P. J. Cain) 和安東尼·霍普金斯 (A. G. Hopkins) 提出的「紳士資本主義」(gentlemanly capitalism) 觀，則進一步強調，「協作互動」(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 是英國自由貿易帝國主義在「非正式帝國」地區中運作的基本特點。³他們認為，這種「紳士資本主義」包含了金融、服務等諸多「非工業」的資本主義形態，是英帝國帶動下，從 1688 年延續至今的世界主義「全球化」進程中最基本的動力。⁴至此，

1 帝國史研究內部很早便意識到了這一點。參見：W. David McIntyre, *The Imperial Frontier in the Tropics, 1865-75, A Study of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in West Africa, Malaya and the South Pacific in the Age of Gladstone and Disraeli*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67), pp.359-371; Robinson, Gallagher, and Denny,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the Climax of Imperialism*, pp.379-409。

2 例如 D. C. M. Platt 基於英國在拉丁美洲影響的分析對非正式帝國提出的批評，D. C. M. Platt, "Further Objections to an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1830-60,"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6, no. 1 (1973): pp.77-91，以及 Britten Dean 提出中英鴉片貿易「對中國經濟發展更有利」的判斷，並以此對「非正式帝國」觀念進行批評，Britten Dean, "British Informal Empire: The Case of China,"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 Comparative Politics* 14, no. 1 (1976): pp.64-81。

3 P. J. Cain and A. G.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 1688-2015*, 3 ed. (London: Routledge, 2016), p.265.

4 Cain and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 1688-2015*, 705-25. 這個「紳士資本主義」觀在兩人 1980 年代多篇合作的論文中便已被提出。參見：P. J. Cain and A. G. Hopkin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itish Expansion Overseas, 1750-191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3, no. 4 (Nov. 1980): pp.463-490; P. J. Cain and A. G. Hopkins, "Gentlemanly Capitalism and British Expansion Overseas I. The Old Colonial System, 1688-1850,"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9, no. 4 (Nov. 1986): pp.501-525; P. J. Cain and A. G. Hopkins, "Gentlemanly Capitalism and British Expansion Overseas, II: New Imperialism, 1850-1945,"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0, no. 1 (Feb. 1987): pp.1-26。

1 這一點，在羅賓遜回應美國帝國史研究的一篇文章中表現得極為明確。參見：Ronald Robinson, "Wm. Roger Louis and the Official Mind of Decolonization,"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27, no. 2 (1999): pp.1-12.

2 Gallagher an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由「自由貿易帝國主義」衍生出的討論，創造了從 19 世紀至今的自由主義「解放」全世界的神話，將「不列顛治世」與「美利堅治世」連接在了一起。在商業創造文明進步這一神話下，帝國的辯護士們用「全球化」的表述，並幾乎已經將英美兩個帝國從「帝國主義」的罪惡中「拯救」了出來。

將「帝國主義」概念去政治化的第三個層面，是將「種族主義」從帝國的秩序觀、發展觀中徹底分離出去。一個常見的認識是，種族主義是國家官僚制度，而非資本主義的惡。對這一觀點的系統論述來自漢娜·阿倫特 (Hannah Arendt)。¹ 在早期自由主義思想家的世界秩序想像中，「種族」像是一個缺席的範疇。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用普遍道德構建起的「人」的概念。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社會等級秩序，以及「文明」與「野蠻」的文明秩序論述，則僅僅是基於不同文化習俗而推導出的衍生性觀念。² 而自上而下的啟蒙式的「教育」，則是抹平這類差異的根本途徑。³ 對於 19 世紀英國推崇自由主義的帝國主義者而言，教育與商業提供了消解「自由」與「帝國」這組矛盾的關鍵路徑。⁴ 帝國也由此被美化為促進「人類」普遍文明與商業繁榮的制度保障。由此，被自由主義去除了種族範疇的帝國主義秩序，堂而皇之地披上了一層「自由世界主義」(liberal cosmopolitanism) 或是「共榮聯邦」

(commonwealth) 的外衣。¹

但是，隨着 19 世紀後半期歐美國家爭奪世界霸權秩序地位而開啟的「帝國時代」，其歷史進程絕不像漢娜·阿倫特所描述的那樣，是資產階級與國家相互競爭，並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導致「資產階級摧毀民族國家」，最終獲得「得不償失的勝利」。² 相反，自 19 世紀以來的歐美全球霸權秩序的形成與變遷，恰恰是在資產階級與國家共謀的情況下才得以成為現實。形成帝國主義秩序的原因，也不僅僅在於資本主義對資本全球流動，以及對海外原料、消費市場的渴望。更重要的是，這種由國家暴力保障的霸權秩序，創造了能夠將世界特定地區、特定人羣鎖定在壓迫鏈條的底端，確保另一個極少數的羣體能夠穩定獲利的基本結構。

1 Hannah Arendt, *Imperialism, Part Two of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68), pp.65-101.

2 對於「種族」範疇在 18-19 世紀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論述中的缺席，參見：Uday Singh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 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Liberal Though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p.51-64。

3 洛克 (John Locke) 針對這一點進行了系統地闡述。參見：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 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Liberal Thought*, pp.61-63。

4 關於帝國與自由的矛盾關係，以及自由主義者為帝國進行的辯護，參見：Armitage,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pp.146-169。關於 19 世紀帝國主義者以文明教化為藉口，為帝國擴張，「種族融合」做辯護的討論，參見：Miles Taylor, "Imperium et Libertas? Rethinking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19, no. 1 (1991): pp.1-23。

1 一個最典型的自由主義帝國說辭就是，自由的國家，其政體是團結所有公民的基礎，由此建立起的公民身份認同超越了種族文化 (ethno-cultural) 身份差異。自由主義神話對美國「大熔爐」的形象塑造，本質上延續了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自由帝國主義者針對英帝國統治合法性進行的說辭。關於今天美國自由帝國主義的種族敘述，參見：Linda S. Bishai, "Liberal Empi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7 (2004): pp.48-72。關於 19 世紀美國自由帝國主義者對全球擴張，特別是對統治「低等種族野蠻人」的合法性論述，參見：Richard H. Immerman, *Empire for Liberty, A History of American Imperialism from Benjamin Franklin to Paul Wolfowitz*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29-162.

2 Arendt, *Imperialism, Part Two of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p.3-4.